

## 冷战、亚非作家会议与印度作家的“反-反殖民”立场之辨

贾 岩

**摘要：**1958年10月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以亚非作家为主体的国际文化盛事。印度派出了由26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试图增强自身在第三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大会开幕前夕，印度代表团团长班纳吉和安纳德就议程设置提出质疑，抗议将反殖民主义列入大会议程第一项。此举遭到其他与会国作家的批判，印度代表团由此被贴上“反-反殖民主义”的标签。通过考察印度作家组建代表团、参加筹委会、出席正式会议的全过程，特别是其间浮现的观念冲突和立场分歧，可以还原一个印度视角下的塔什干会议，并揭示“反-反殖民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层考量。作为印度代表团团长，班纳吉和安纳德思考行事的出发点不再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格局下印度国际关系和外交路线的影响。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印度在第三世界作家运动中的开创者地位和此前在德里亚洲作家会议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破坏印度与西方世界的友好关系。这场戏剧性的风波体现了冷战初期印度知识界的复杂生态，也反映了印度从前殖民地到独立大国转型过程中的身份焦虑。

**关键词：**印度；作家；亚非作家会议；反殖民主义；冷战

**收稿日期：**2021-11-12

**作者简介：**贾岩（1988~），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语言文学、中印文学关系、印度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进步主义文学思潮中的‘中国动因’研究”（项目批准号：21CW007）的阶段性成果。

1958年10月7至13日，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塔什干，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在整修一新的纳沃伊歌剧院如期举行。来自19个亚洲国家、11个非洲国家

以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近两百名作家参加了这次集会，另有来自12个欧美国家的观察员应邀列席。“洋洋乎壮观”的迎接人群让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感慨不已，他想象起一千多年前各国游商在塔什干这座丝绸之路驿站往来云集的盛景。在茅盾看来，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召开，不仅仅是往昔辉煌的重现，更是当下对历史的全面超越：

今天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亚非的交往和集会，开始了亚非作家们的历史性的第一次“庙会”；今天交流的是亚非作家的为民族独立，为反对殖民主义，为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而进行斗争的宝贵经验和互相支援的友谊！<sup>①</sup>

在诸多新主题中，“反殖民主义”被中国官方视作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sup>②</sup>同时被写入大会议程第一项，成为与会各国作家讨论的焦点。用茅盾的话说，会议期间“各种语言的放言谏论和细致分析”本质上使用的“实在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即“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控诉殖民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危害，保卫民族文化传统，加强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sup>③</sup>

如果反殖民主义确实以某种“共同语言”的形式构筑了塔什干会议的沟通基础，那么印度作家无疑在这场会议中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大会开幕前夕，印度代表团团长塔拉尚卡尔·班纳吉和穆尔克·拉吉·安纳德就议程设置提出异议，强烈反对将反殖民主义加入大会议程。身为甘地主义者，班纳吉一度考虑以率团离会、辞任团长等非暴力方式向大会施压；长期活跃于国际文化舞台的安纳德也在各国代表中积极游说，力劝其对议程进行修改。他们的努力最终以失败收场，不仅反殖民主义得以保留，成为贯穿全会的主线，二人逆势而为的抗争举动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作家留下了“讨厌之至”的印象，<sup>④</sup>同时让不少同行的印度代表团成员感到自己成了“其他亚非国家的笑柄”。<sup>⑤</sup>此次争议事件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

---

① 茅盾：《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

② 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就塔什干会议发表的社论中，反殖民主义均出现在标题位置：《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4日社论题为《亚非作家们，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前进！》；《文艺报》1958年第18期社论题为《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祝亚非作家会议开幕》。

③ 茅盾：《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

④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⑤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śiyāī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30.

至于印度代表团一度被贴上了“反-反殖民主义”（anti-anticolonial）的标签。<sup>①</sup>

发生在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的这场颇具戏剧性的风波背后，隐藏着一个吊诡但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从未彻底沦为殖民地的中国，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十年的这场跨国文学集会上高举反殖民大旗，而不久前刚刚亲历英殖民统治并与之作战的印度作家，却在后独立时代拒绝加入塔什干会议的反殖民浪潮？关于问题的前半部分，王中忱、黎跃进、熊鹰等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sup>②</sup>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即印度作家看似违背常理的“反-反殖民”倾向，国内外学界尚无深论。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缺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长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苏联等国家比印度更加决定性地影响了亚非作家运动的长期走向，从而吸引了更多学术关注。这使得印度在运动初期扮演的关键角色，难以避免地遭到忽视或低估。例如，1956年在德里召开的第一届亚洲作家会议，虽在理念和形式上直接启发了1958年塔什干会议，却长期游离在亚非作家运动相关研究的视域之外。<sup>③</sup>其次，已有研究在谈及印度作家的参会情况时，大多依据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间接记录，鲜有出自印度作家和媒体的直接记载。缺少对印度本土档案（特别是本土语种资料）的挖掘和梳理，为深入考察印度在塔什干会议期间的微妙处境造成了客观上的技术困难。

笔者利用在印度国家文学院、尼赫鲁纪念图书馆、印度共产党总部等地搜集的印地语和英语一手资料，辅以中文档案中的相关记录，试图尽可能全面地还原一个印度视角下的塔什干会议。本文通过考察印度作家组建代表团、参加筹委会、出席正式会议的全过程，以及其间表现出的观念冲突和立场分歧，试图揭示“反-反殖民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层考量。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印度知识分子在冷战两极对峙和第三世界团结运动双重影响下的复杂境遇，以及亚非作家运动内部由交错多变的国际、国家和国内关系所塑造的多元生态。

---

① Krishnalal Shridharani, “Association and Isolation at Tashkent”, *Indian Literature*, Oct.1958 ~ Mar.1959, p.59.

② 参见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黎跃进：《亚非作家会议的民族主义审视》，《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熊鹰：《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③ 直至近两年，第一届亚洲作家会议才开始作为专题研究对象出现在学术讨论中。参见拙文：《冷战格局下的亚洲文化选择：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及其历史意义》，《亚太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曾嵘：《1956年中国作协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史料钩沉——兼谈对日本战后文坛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Jia Yan: “Cultural Bandung or Writerly Cold War? Revisiting the 1956 Asian Writers’ Conference from an India-China Perspective”, in *The Cultural Cold War and the Global South: Sites of Contest and Communitas*, eds. Kerry Bystrom, Monica Popescu, Katherine Zie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Adhira Mangalagiri, “A Poetics of the Writers’ Conference: Literary Relation in the Cold War Perio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no.3, 2021.

## 一、印度代表团的组建与构成

想要探究印度作家代表团在1958年塔什干的行为逻辑，必须首先明确：最终成团的印度作家是以何种方式选出的？入选作家分别代表谁？代表性如何界定？不同作家之间有着怎样的理念异同和利益纠葛？这些问题将本文的关注点率先引向1950年代的印度文学场。

我国对独立后印度文学的研究长期遵循“流派为先”的模式，即以流派（或思潮）为主要分类单元，而后在不同单元下归入相应作家及其作品。<sup>①</sup>借助这一模式呈现出的1950年代印度（特别是印地语）文坛景象，可大体概括为：“阴影主义”辉煌不再，“进步主义”由盛及衰，“新诗”“新小说”趋于主流，“边区文学”异军突起。然而，正如下文即将揭示的那样，当“印度文学”需要以作家而非作品形式呈现于国际舞台时，分类标准就不再是流派、风格等文本因素，而是作家的创作语言、政治倾向、组织归属等社会因素。一方面，上述文学流派的本地特色使其难以在国际层面获得快速有效的理解和共鸣，各种流派间美学边界的流动性也使作家代表性的界定变得困难。另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对文学、语言和文化生活的政策性干预，以及冷战影响下印度作家内部日益严重的阵营化，都使文学外在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功能变得更加突出。这在印度代表的遴选过程中有充分体现。

通过梳理《印度时报》1958年8至11月刊载的九篇相关报道，我们可以勾勒出印度筹备塔什干会议的大体情况及其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1956年的德里亚洲作家会议一样，塔什干会议被印方定性为非官方活动。所谓“非官方”，指印度政府及其下设文化机构（如印度国家文学院）不承担实质性的组织或赞助工作，只提供象征性的辅助支持。<sup>②</sup>代表遴选由一个专门组建的筹委会负责，<sup>③</sup>班纳吉和安娜德是最初的召集人，介南德尔·古马尔后被增补为第三位召集人。<sup>④</sup>

---

<sup>①</sup> 有关独立后印度多语种文学的综合研究，参见石海峻：《20世纪印度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本书聚焦20世纪下半叶印度文学的内容共计六章，分别是“新诗与新小说”“边区文学”“社会现实主义小说”“非诗派、非小说派及其后的文学”“女性文学与贱民文学”“印度英语小说”。其中，前五章均以流派为纲，唯有最后一章采用了语种与体裁结合的分类标准。有关独立后印度单一语种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薛克翘、姜景奎等：《印地语文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该书对印度独立后印地语文学的讨论包含“进步主义和心理分析小说家”“‘边区文学’作家”“戏剧家珀德与阿谢格”“‘新诗’派”“‘新小说’派”“20世纪后期印地语文学”六章，同样沿用了流派为主、体裁为辅的分类法。

<sup>②</sup> “Writers’ Mee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7, 1958, p.6.

<sup>③</sup> “Afro-Asian Writers: Talks in Tashkent on October 1”,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31, 1958, p.4.

<sup>④</sup> “Writers’ Mee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7, 1958, p.6.

三位作家都曾在德里会议中担任要职，由此可见两次会议之间的延续性。<sup>①</sup>

关于如何选择作家代表，筹委会的方案是以1950年印度宪法《第八附表》确定的14种“表列语言”为基本框架，<sup>②</sup>同时参考印度国家文学院提供的杰出作家名单，优先向名单上每个语种的前两位作家发出邀请，若对方拒绝，再依次考虑排在后面的作家。<sup>③</sup>根据《印度时报》提供的数据，最终共有来自10个语种的26名作家确认参会，他们组成了奔赴塔什干的印度代表团。<sup>④</sup>在各与会国之中，印度派出的作家数量仅次于东道主苏联，足见其重视程度。

上述遴选方案尝试兼顾语际平等和作家水准，并借助官方确立的权威标准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它将选拔和邀请两种模式结合，在赋予筹委会主动权的同时，也充分尊重了受邀作家的自主性。然而，这套看似合理的遴选方案，却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了介南德尔·古马尔、拉姆塔利·辛格·丁格尔等筹委会成员的重重挑战，他们将质疑的矛头重点指向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遴选程序。异见作家称，筹委会内以萨加德·查希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左翼作家，私自将邀请函发给未经筹委会商议的作家人选，违反了既定的遴选程序，甚至有“党派化”之嫌。<sup>⑤</sup>古马尔和丁格尔担心自己被筹委会架空并利用，因为他们感觉“正在为自己根本无法负责或无法影响的事情背书”。<sup>⑥</sup>第二，团长资质。异见作家表示，1956年德里会议期间，印度代表团团长一职最初由科研与文化事务部部长胡马雍·卡比尔担任，后因卡比尔因故离会，才由班纳吉接任。因此，班纳吉作为德里会议印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值得商榷，也就无

---

① 德里会议期间，安纳德是大会秘书长，他和古马尔同为印度代表团召集人，班纳吉曾在会议后半段担任印度代表团团长。

② 即阿萨姆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卡纳达语、克什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提语、奥里萨语、旁遮普语、梵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乌尔都语。在随后的历次修订中，《第八附表》所含语种增加到了今天的22个。1967年新增信德语，1992年新增孔卡尼语、曼尼普尔语、尼泊尔语，2004年新增博多语、多格拉语、迈提利语、桑塔利语。参见印度内政部官网文件：“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relating to Eighth Schedule”等，[https://www.mha.gov.in/sites/default/files/EighthSchedule\\_19052017.pdf](https://www.mha.gov.in/sites/default/files/EighthSchedule_19052017.pdf)。

③ “Writers’ Mee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7, 1958, p.6.

④ 目前无法找到完整的印度代表团26人名单。笔者从已经掌握的诸多资料中共识别出其中的16人，包括印地语作家Yashpal、Shivdan Singh Chauhan、Vijay Chauhan、Jagat Shankhdhar，孟加拉语作家Tarashankar Banerjee、Gopal Haldar、Suniti Kumar Chatterjee，乌尔都语作家Ghulam Rabbani Taban、Rajendra Singh Bedi、Sajjad Zaheer，旁遮普语作家Sant Singh Sekhon、G.S.Mansukhani，马拉提语作家Pralhad Keshav Atre，古吉拉提语作家Krishnalal Shridharani，信德语作家Sardar Govindsingh，以及英语作家Mulk Raj Anand。需要说明的是，英语并非“表列语言”，安纳德很大程度上以印方组织者的身份入选。

⑤ “Delegates to Asian Writers’ Talks: Selection Criticised by Four Members”,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3, 1958, p.6.

⑥ “Writers’ Meet”,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3, 1958. p.6.

法在塔什干会议期间“自动”连任团长一职。<sup>①</sup>第三，旅行经费。与德里会议不同，此次亚非作家会议在印度境外举办，从而涉及国际旅费的问题。根据筹委会的要求，所有入选作家须自行购买往返塔什干的机票，安纳德称“这是印度外交部的规定”。<sup>②</sup>古马尔和丁格尔则认为，“一个代表是否受邀，应当单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造诣，而非他们承担相应开销的能力和意愿”，经费问题使代表遴选变得“武断”，甚至成了“为党派目标服务的圈套”。<sup>③</sup>由于在该问题上无法调和，古马尔和丁格尔最终选择退出筹委会，放弃了参加塔什干会议的机会。

上述争议表面上关乎程序、人选、经费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本质上却是异见作家对共产主义的警惕甚至敌视，它清晰地反映出冷战时期印度作家内部结构化的意识形态分野。早在德里会议期间，这一分野已经显露无遗，主要表现为亲美、反共的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成员和亲苏、亲华的全印进步作家协会成员在会场内外的较量。<sup>④</sup>然而，在塔什干会议印度代表团的组建过程中，几乎没有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成员直接参与的迹象，他们很可能囿于会议在苏联举办的现实，不便或不愿涉足其中。该委员会以及持相似政治立场的文化团体（如印度笔会）主要从外部对塔什干会议进行舆论攻击，<sup>⑤</sup>而筹委会内部的批判声音则来自古马尔、丁格尔这些组织上不隶属于上述团体，但在观念上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作家。二人的退出理论上意味着印度代表团内部阻力的进一步削弱。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异见者的指控中，班纳吉和安纳德在政治光谱上往往被推向共产主义阵营一方。《印度时报》不止一次在报道中暗示他们与查希尔等共产党员作家构成了筹委会中的“多数人团体”，甚至明确使用了“安纳德-查希尔集团”等党派化标签。<sup>⑥</sup>之所以做这样的阵营划分，一方面与两位团长在筹

---

① “Delegates to Asian Writers’ Talks: Selection Criticised by Four Members”,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3, 1958, p.6.

② “Writers’ Mee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7, 1958, p.6.

③ “Delegates to Asian Writers’ Talks: Selection Criticised by Four Members”,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3, 1958, p.6.

④ 详见贾岩：《冷战格局下的亚洲文化选择：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及其历史意义》，《亚太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1~204页。

⑤ 据报道，印度笔会秘书长在针对塔什干会议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考虑到这场会议的赞助方、会址及其他因素，整个活动似乎都被政治目的所充斥”，他甚至称此次会议的意图是“对作家进行政治剥削”。参见“Delegates to Asian Writers’ Talks: Selection Criticised by Four Members”,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3, 1958, p.6. 经考证，在上文列举的16位印度作家代表中，没有印度文化自由委员会成员，只有一位印度笔会会员，即旁遮普语作家G.S.Mansukhani。有关他的访苏印象，参见*The Indian P.E.N.*, January 1959, p.81.

⑥ “Delegates to Asian Writers’ Talks: Selection Criticised by Four Members”,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3, 1958, p.6.

委会事务中的具体决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两人长期以来的左翼联系有关。安纳德是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专注于底层书写的进步主义小说家。尽管在1940年代末印共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他被排挤出进步作家协会，但此后依然活跃于各类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与苏联、中国往来甚密。班纳吉常被视为甘地主义作家，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他在自传《我的文学生涯》中表示，虽未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在印度乡村游历的直接体验让他认同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班纳吉的作品中不乏对马克思、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正面描写，他的小说“代表了一种以浪漫化的方式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倾向”。<sup>①</sup>

异见势力的缺席和两位团长的左翼情结似乎意味着，参加塔什干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已经在观念和立场上取得了高度统一。然而，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那样，代表团内部实际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分化，主要可划分为三类作家。第一类是查希尔、西沃丹·辛格·觉杭所代表的左翼作家；第二类是班纳吉、安纳德两人，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他们的左翼倾向之上叠加了强烈的国家意识，使他们区别于第一类作家。第三类是以克里希那拉尔·室利塔尔尼为代表的少数右翼作家。随着反殖民议题的出现，三者之间的分歧充分暴露。那么，反殖民主义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大会议程的？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对印度代表团来说，这一变化究竟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

## 二、国际局势影响下的议程异动

塔什干会议于1958年10月召开。此前，大会议程的制定历时数月之久，两次先导会议在这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次是195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预备会议，另一次是9月在塔什干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中国和印度是少数两次先导会都受邀参加的国家，体现了主办方对这两个亚洲大国的重视程度。

6月的预备会议标志着塔什干会议准备工作的正式启动。出席会议的作家代表来自苏联、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合众国五个国家。<sup>②</sup>即将以团长身份率队前往塔什干的班纳吉和安纳德参加了此次预备会议。据安纳德称，苏联方面之所以邀请他们二人，“显然是因为他们在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上作为印度代表团团长和大会秘书长的身份”。<sup>③</sup>

莫斯科预备会议初步拟定了八项会议议题，即“亚非国家各自的文学发

---

<sup>①</sup> Sisir Kumar Das,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1911-1956*,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5, pp. 84 ~ 85.

<sup>②</sup> 阿拉伯合众国是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包括埃及与叙利亚）和也门王国（即后来的北也门）在1958至1961年期间组成的邦联。

<sup>③</sup> “Writers’ Mee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7, 1958, p.6.

展”“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国际局势及其对作家的影响”“儿童文学的问题及其教育意义”“妇女对文学的贡献”“亚非国家戏剧文学的发展”“文学与广播、电影及戏剧的关系”和“促进亚非国家作者的交流”。除了第三项涉及国际政治，该议题设计方案总体上具有明确的文学导向，与德里会议议程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和延续性，这有可能是班纳吉和安纳德努力干预的结果。<sup>①</sup>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初拟的八个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带有“反殖民”字眼或类似表述。

与预备会议的建议性不同，9月的筹委会会议旨在决定正式会议的各项事宜，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讨论确定大会及分会议程。组成筹委会的作家代表来自中国、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苏联、日本、蒙古、喀麦隆等十个国家。正是在这次会上，“反殖民主义”被加入大会议程，并排在各项议题之首。这一变化与中国的推动密切相关，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急速转向。

回看1956年12月的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彼时参会的中国作家很少谈及反帝、反殖民等政治议题，而是把交流重心更多地放在文化层面。这一时间点恰逢中国外交政策的“万隆时期”（1955~1957年），其核心导向是与各国和平共处，其中包括对美国的缓和态度。<sup>②</sup>这一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意在尽可能多地争取新朋友，从而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更为有利的国际地位，以便实现解放台湾地区、加入联合国等目标。然而，从1958年8月起，艾森豪威尔当局对台湾海峡进行帝国主义武力干预，由此引发台海危机，使中美两国面临继朝鲜战争之后再度陷入正面军事对抗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同时将反帝、反殖民主义摆在整体外交方针的核心位置。

台海危机从8月23日持续到9月22日，而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筹委会会议恰好在这期间举行，因此被中国领导人视为一个极其难得的国际平台，用以宣示重新设定的外交方针，并团结更多亚非国家组成反美国际阵线。因此，相较于参加莫斯科预备会议的戈宝权 and 袁水拍，9月的筹委会会议上中方派出了级别更高的中国作协书记刘白羽和副书记郭小川，以示重视。茅盾在大会发言中也充分强调了中方“旗帜鲜明”“广泛团结”的方针：

---

<sup>①</sup> 德里会议的四个议题分别是“亚洲的文化传统”“自由与作家”“作家和他的职业”“文化交流”。

<sup>②</sup> 参见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pp.5 ~ 10.



最近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挑衅，这已激起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巨大的愤慨……中国作家也已经坚决调动一切力量，运用文学的武器，投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神圣斗争……同样，我们也知道，亚非各国作家和他们的人民一道，在我国抗美援朝斗争中，以及这次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挑衅的斗争中，都曾以行动和正义的笔支援过中国人民。<sup>①</sup>

在茅盾的发言中，以美国为化身的帝国主义被表述为一个进行之中且不断升级的全球威胁，以及与广大亚非国家休戚相关的现世隐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取得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高举反殖民旗帜，有助于和那些曾经或正在经历殖民苦难的亚非人民结成情感和道义上的反霸权战线，亚非作家则是这场战役中以笔为枪的精神斗士。

与中方急转直上的重视度相比，印度对待此次筹委会会议的态度反而显得相当随意。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班纳吉和安纳德的双双缺席。从《印度时报》相关报道提供的时间线来看，从8月17日印度筹委会成立到9月10日塔什干筹委会会议召开，班纳吉和安纳德一直忙于印度代表团的组建事宜，包括应对异见人士不断发出的挑战。代表印度参加筹委会会议的是旁遮普语作家森德·辛格·塞孔和孟加拉语作家戈巴尔·哈尔达尔。两人虽是各自语种的重要作家，却不像安纳德那样长期活跃于印度文化外交一线，也不像班纳吉那样在文学和政治领域同时享有高度的官方认可。<sup>②</sup>更为特殊的是塞孔和哈尔达尔的政治身份，他们两人都是隶属于印度共产党的左翼作家。这一人选或许可以解释为，印方希望通过两位共产党员作家，提前与主办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联络感情，建立沟通基础。而古马尔、丁格尔等异见作家的退出，使该人选成为可能。

事实上，塞孔和哈尔达尔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无条件地支持中国提出的将反殖民主义列为大会议程第一项的方案。根据西沃丹·辛格·觉杭用印地语撰写的《塔什干日记》，塞孔和哈尔达尔曾明确向筹委会表达过“遵照原样通过莫斯科版议程”的意见，<sup>③</sup>但因遭到苏联之外所有国家的反对而作罢。二人对于议程变更的反应相当温和，这一点从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记录中均可得到印证。塞孔在自传中简略记述了赴塔什干参加筹委会会议的经历，但他几乎将全

---

① 茅盾：《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② 班纳吉1955年被西孟加拉邦政府授予“罗宾德拉奖”，1956年获“印度文学院奖”。他曾于1952至1960年担任西孟加拉邦立法院成员。

③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śiyāi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i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30.

部笔墨用于描写自己在集体农庄和费尔干纳（巴布尔诞生地）的见闻，而非会议期间的讨论。<sup>①</sup>可见会程本身并未给他留下具有冲击力的印象。郭小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筹委会会议期间与各国代表协商议程调整方案的经过，其中有两处涉及印度：“9月9日：十二时开会，今天由印度做主席，开得格外简单，一时多就完了”；<sup>②</sup>“9月20日：刚要休息，又开小组会，讨论印度朋友塞豪的建议。到五时多。打台球。”<sup>③</sup>从郭小川轻描淡写的记录可以看出，两位印度代表在反殖民主义进入大会议程的问题上，并未制造明显阻力。

结合事件的后续走向来看，塞孔和哈尔达尔并未将议程变更的情况及时告知身在德里的班纳吉和安纳德。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抑或因为距离大会开幕仅有数周时间，来不及将消息发回国内；抑或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议程变更可能带来的风险，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与此同时，缺乏国际政治斗争经验的班纳吉和安纳德，也没有依据台海危机、中美关系恶化、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等重大时局，预判到亚非作家会议的性质变化。种种因素共同导致了两位印度团长抵达塔什干后的意外反应，以及本文开篇描述的戏剧性场景。

事实上，当时反应最为激烈的印度代表并非两位团长，而是代表古吉拉提语参会的克里希那拉尔·室利塔尔尼。这位拥有深厚美国背景的印度记者，虽不公开隶属于任何反共组织，但对共产主义一贯抱有敌意。<sup>④</sup>在觉杭笔下，室利塔尔尼被刻画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煽动者”。当其他印度代表试图化解冲突的时候，只有他不断怂恿两位团长向大会施压，还为此提出三个抗议方案：一是在大会伊始罢会，直接返回印度；二是从代表席转入观众席；三是保持既不阻挠也不参与的局外人立场。<sup>⑤</sup>尽管上述方案被大多数印度代表否决，但室利塔尔尼的行为无疑为班纳吉和安纳德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我们从郭小川日记可以清晰感受到印方抗议的决心，以及中方化解这一问题的不易：

10月6日：……[刘]白羽来，印度代表团已与茅[盾]、周[扬]、巴[金]谈完，他

<sup>①</sup> Tejwant Singh Gill (ed.), *Sant Singh Sekhon: Selected Writings*, Delhi: Sahitya Akademi, pp.354 ~ 355.

<sup>②</sup>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sup>③</sup>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塞豪”即塞孔。

<sup>④</sup> 德里亚洲作家会议期间，室利塔尔尼和丁格尔、古马尔等作家一起，对会议发表了“赤色控制”的指控。参见Jia Yan: “Cultural Bandung or Writerly Cold War? Revisiting the 1956 Asian Writers’ Conference from an India-China Perspective”, in *The Cultural Cold War and the Global South: Sites of Contest and Community*, eds. Kerry Bystrom, Monica Popescu, Katherine Zie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32.

<sup>⑤</sup>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siyāi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30.

们坚持他们的意见，而且说是苏联的方案。……晚上，在门口散步，与白羽商谈对付印度的办法。咳嗽又头昏，十一时多即睡。

10月7日：……团长决定，立即分头征求各方面意见，广泛活动，搜集情况。因为今天上午，周、刘要与苏联、印度谈议程问题。我们分头出去，与因道约、与缅甸代表团团长和吴大迎、与日本人，均做了接触。大家一致地反对印度的修正案。一时半，开组织委员会，大家一致反对印度的修正案。……五时，开团长和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大家争论了一小时。印度还是孤立。……十一时与茅、刘一起回来吃饭，继续开会。班纳吉和安纳德又作了长篇的演说，弄得大家讨厌之至。然后一致地决定了不改变议程。最后，班纳吉妥协了。会议才得了一致的结果。会开到二时多。兴奋之至，回来不眠，吃了安眠药，约三时多睡。<sup>①</sup>

正如室利塔尔尼在随笔中所写的那样，塔什干会议表面上洋溢的“兴奋、多彩和温暖的同伴之谊”背后，是印度作家“极致的孤立”和“彻底的孤独”。在他看来，班纳吉和安纳德通过“伟大的异见时刻”所发出的“孤独之声”，是印度在塔什干会议上仅有的成绩。<sup>②</sup>同样是这些“异见时刻”，却给其他与会的亚非作家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最直言不讳的批判来自巴基斯坦作家费兹·艾赫迈德·费兹。这位曾和在场的印度作家同属一国的乌尔都语诗人，从共享殖民历史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十年前，印度也曾处于奴役之中。它曾是大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殖民主义正是它在独立斗争中所反抗的敌人。那时候，印度曾向世界上所有已经独立的国家索取同情。而今，独立后的印度成了所有受奴役的亚非国家寻求启迪、同情和各类援助的对象。倘若印度在品尝了十年的独立滋味以后，转而忘却了自己的殖民过往或是无数亚非国家正在与殖民主义斗争的现实，那它将毫无光彩可言。<sup>③</sup>

费兹的控诉无疑在会场上引发了众多亚非作家的共情。然而，从研究者的批判性视角出发，我们必须追问：班纳吉和安纳德反对将反殖民主义列入议程的举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简单地解读为印度对自身殖民历史的“健忘”，抑或对其他

---

<sup>①</sup>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sup>②</sup> Krishnalal Shridharani, “Association and Isolation at Tashkent”, *Indian Literature*, Oct. 1958 ~ Mar. 1959, pp. 57 ~ 58.

<sup>③</sup>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siyāi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 22.

（前）殖民地国家的“背叛”？当我们把印度代表团的行动和言论置于更加广阔的亚非作家运动和全球冷战背景中进行检视时，或许可以发现更为复杂的现实考量。

### 三、德里遗产与国家利益

回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亚非作家运动史，<sup>①</sup>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并非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而是1956年12月在德里召开的第一届亚洲作家会议。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国，以及第三世界跨国作家集会的首倡者，印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努力。德里会议“很大程度上直接受万隆会议启发，是‘万隆精神’在文化领域的再现，也是印度借助文学在第三世界推广不结盟政策的实践”。<sup>②</sup>在不结盟理念的引导下，德里会议的组织者和为其背书的政府官员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反冷战意识，主要体现为对会议议程中政治因素的严格限制，从而避免与会作家陷入意识形态论战，同时防止会议被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主导。正如前印度内政部部长查戈尔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在德里会议致辞中强调的那样：“我并非让你们彻底摒弃政治，而是要你们将它放进另一间屋子。仅就作家会议而言，你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你们是作家，而非政客。”<sup>③</sup>尽管德里会议难以避免地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但总体上依然保持了主办方预设的文化重心。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组织者的程序安排。他们将议题限定在文学/文化范畴之内，缩减了投票、表决等带有政治色彩的程序，还利用东道主优势在十三人秘书处中占据九席，以保证印度方案得以贯彻。种种操作使得作为主办方的印度较为有效地主导了德里会议的基调和走向。<sup>④</sup>

从德里到塔什干，从“亚洲”到“亚非”，变化的不仅是会址和规模，更是与会各国之间的话语权高低。在塔什干，东道主苏联扮演关键角色，中国、阿拉伯合众国强势介入，撒哈拉以南非洲代表积极发声，而“反主为客”的印度代表团此番则处在一个相当被动的位置上。面对会场上一边倒的反帝反殖民声浪，两位印度团长的抗争实际上是对德里遗产的一种“抢救”。在他们看来，反殖民主

---

<sup>①</sup> 亚非作家会议共举办六届：1958年，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1962年，埃及开罗；1967年，黎巴嫩贝鲁特；1970年，印度新德里；1973年，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阿拉木图；1979年，安哥罗安达。

<sup>②</sup> 参见拙文：《冷战格局下的亚洲文化选择：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及其历史意义》，《亚太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1页。

<sup>③</sup> “Writers Must Be Free to Write What He Feels: Mr. Rajagopalachari’s Call at Asian Conference”,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25, 1956, p.8.

<sup>④</sup> 参见拙文：《冷战格局下的亚洲文化选择：1956年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及其历史意义》，《亚太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1页。需要指出的是，印方强调非政治性的做法本身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

义进入议程将使亚非作家会议脱离德里会议设定的文化轨道，进而违背了印度利用这一平台推广不结盟理念、强化第三世界领袖地位的初衷。换言之，班纳吉和安纳德所排斥的并非反殖民主义本身，而是反殖民主义以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方式与文学挂钩。室利塔尔尼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作家会议将殖民主义作为主要议题，并且发展到认为作家和文学有能力与殖民主义战斗的地步时，它就不再是一个作家会议了。”<sup>①</sup>

塔什干会议对德里遗产的侵蚀不仅体现为政治化的大会议程，还体现为苏联对会议创始者身份和主导地位的争夺。从客观角度看，塔什干会议的雏形源于德里。正是在德里会议的闭幕式上，乌兹别克诗人祖尔菲亚代表苏联亚洲地区的作家们，发出了再聚塔什干的邀约。当时，塔什干会议是作为第二届亚洲作家会议被提出的。<sup>②</sup>致使其变为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关键事件是1957年12月26日至1958年1月1日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第一次大会。该组织由苏联主导，是其在万隆框架之外开辟的团结第三世界、制衡美国的核心阵地。<sup>③</sup>开罗会议通过了号召亚非作家积极参加塔什干会议的决议，首次将塔什干会议纳入苏联主导的“亚非”政治体系。随后，1958年6月的莫斯科预备会议正式同意非洲作家加入，塔什干会议由此扩大为亚非作家会议。在此过程中，苏联既是推手，也是最大的受益方。它从德里模式的“复制者”，成功转变为一项更大工程的奠基人。室利塔尔尼的会议记录印证了苏联的雄心：“印度发言者不断将塔什干会议的源头追溯至德里的亚洲作家会议，而风度翩翩的大会首脑沙拉夫·拉西多夫却将它的起点认定为开罗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sup>④</sup>由此可见，苏联为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文学团结运动提供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缘起说，这套替代性叙事将德里会议排除在外，试图掩盖印度此前所做的贡献。

更加令印方不安的是，苏联的这套叙事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代表的响应。当大会论及设立亚非作家常设局的问题时，班纳吉和安纳德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成立常设局的提议已经在德里会议期间遭到否决，<sup>⑤</sup>塔什干会议应遵从这一决定。室利塔尔尼也表示，常设局即便成立，也应该在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时

<sup>①</sup> Krishnalal Shridharani, "Association and Isolation at Tashkent", *Indian Literature*, Oct. 1958 ~ Mar. 1959, p. 58.

<sup>②</sup> "World Writers' Views on 'Crisis of Culture'",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29, 1956, p. 3.

<sup>③</sup> 苏联并未受邀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加1955年的万隆会议。

<sup>④</sup> Krishnalal Shridharani, "Association and Isolation at Tashkent", *Indian Literature*, Oct. 1958 ~ Mar. 1959, p. 58. 拉西多夫任塔什干会议筹委会主席，他曾率庞大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在开罗举办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sup>⑤</sup> 该提议由印度共产党员作家提出，被自由派作家否决。后者认为，这样一个常设机构“可能会被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所控制”，理由是“他们能够从政府获得支持”。参见“Delegates to Asian Writers' Talks: Selection Criticised by Four Members”,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3, 1958, p. 6.

间和地点”。<sup>①</sup>然而，印度的建议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特别是新加盟的非洲作家。他们称，“在德里做出的决议对塔什干会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他们有做出任何新决定的自由”。<sup>②</sup>最终，大会通过了组建常设局的提议，两位印度团长选择拒绝加入。

除了维护德里遗产，班纳吉和安纳德反对将反殖民主义加入大会议程的行为，还与彼时冷战格局下的印度处境有关。作为在重大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代言人”，他们思考决判的出发点绝不仅仅是个人喜好，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国家利益。根据觉杭《塔什干日记》的记录，尽管出席此次会议的印度代表团被标榜为“非官方”团体，但两位团长在行前确曾当面接受过尼赫鲁的指示。指示的具体内容难以知悉，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位团长在会议期间经常把“如何向尼赫鲁交代”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例如，班纳吉在惊闻议程变化后，对代表团成员说：

我们被欺骗了。回去以后，我该如何向尼赫鲁先生解释？……有些人想把这场会议变成一个政治舞台。这是我所无法容忍的。临行前，安纳德博士和我曾面见尼赫鲁先生，他说这类会议难以避免地带有政治性，但我们应努力不让它的文学特质消失。而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他呢？<sup>③</sup>

对两位印度团长而言，比起反殖民主义的内涵，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公开支持反殖民主义所释放的国际信号，及其对印度国家利益的影响。在1956年的德里会议上，作家们探讨了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但在主办方反冷战意识的引导下，探讨的结论并未将殖民主义等同于西方，进而将西方推向亚洲的对立面。例如，“亚洲的传统”小组的总结报告指出：“西方文明对于人类的进步也能做出很大的贡献，作家应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良部分来造福人民，因此东方的传统和西方文明并非是不可协调的。”<sup>④</sup>然而在两年后的塔什干，反殖民话语被直接和明确地与欧美国家对亚非地区进行的霸权主义干预联系起来，“反殖民”几乎成了“反美”“反欧”的代名词。因此，在塔什干会议这样一个重大国际场合加入反

---

<sup>①</sup> Krishnalal Shridharani, “Association and Isolation at Tashkent”, *Indian Literature*, Oct.1958 ~ Mar.1959, p.60.

<sup>②</sup>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śiyāi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30.

<sup>③</sup>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śiyāi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p.19 ~ 20.

<sup>④</sup> 叶君健：《亚洲作家的会见——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叶君健全集》（第17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殖民声讨，势必使印度呈现出过于明显的支持苏东阵营、批判西方世界的姿态。

这一姿态不仅在理念上违背了不结盟政策中尽可能在美苏间保持平衡的原则，还有可能在现实层面损害印度的外交成果和经济利益。塔什干会议召开前后的这段时期，印美两国正在彼此示好，形成了某种互惠互利的关系。1957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印度施行大规模经济援助，以期制衡苏联对这个南亚大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尼赫鲁政府也急切地需要借助美方援助，以便顺利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1年）。<sup>①</sup>事实上，班纳吉和安纳德对这一局势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向其他印度代表解释删除反殖民主义一词的必要性时说：“这个词一旦保留，将被解读成对美、英、法、比、西、葡、荷及其他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的西方国家的谴责。”<sup>②</sup>尽管该言论发表于印度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但两位印度团长的深层用意在中国作家眼中似乎早已不是秘密。袁水拍在会后撰写的评论中，隐晦地将二人比喻为“害怕得罪帝国主义的一股小小的逆流”，并称塔什干会议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sup>③</sup>

班纳吉和安纳德尝试维护印度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的举动，同样受到了来自印度代表团内部的质疑，觉杭、查希尔等共产主义作家的批评尤为犀利。当班纳吉在室利塔尔尼的鼓动下，号召全体印度代表以罢会方式表达抗议时，觉杭和查希尔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我们当然希望这场会议能在不凸显政治色彩的前提下，达到文学层面的高标准。这个词[反殖民主义]若能从议程第一项被移出，那样再好不过。但是，既然绝大多数人都不反对它，我们也就没有罢会或抗议的必要，毕竟这些方法本身就是政治的。如果我们使用这些方法的理由，仅仅是为了抵制一个印度人民——特别是尼赫鲁——从未反对过的词语，那它将背离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国家荣誉。作为亚非诸国中最古老的国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因此，我们更应发挥积极作用，使这次会议办得成功。……试想，倘若印度的提议或修正案在联合国大会上未被通过，尼赫鲁会向代表团下达罢会的指令吗？<sup>④</sup>

---

<sup>①</sup> 参见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7.

<sup>②</sup>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śiyāī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23.

<sup>③</sup> 袁水拍：《让塔什干的火炬永放光明》，《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页。

<sup>④</sup> Shivdan Singh Chauhan, “Pratham Afro-Eśiyāī Lekhak Sammelan 1958: Tāškand Dāyri”, in *Pragatishīl Smṛti-Pravāh*, Jaipur: Rachana Prakashan, 2002, p.21.

如果“中立”是尼赫鲁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塔什干会议上的印度作家则对此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班纳吉和安纳德对“中立”的认识基于冷战的二元对立结构，他们拒绝显露选边站的倾向，以避免损伤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友好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两位团长在塔什干的努力勉强取得了预期中的效果。<sup>①</sup>相比之下，觉杭和查希尔强调的则是在两极对峙之外广阔的第三世界探索“中立”的可能性，前提在于利用各种机会巩固印度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团结互信，提升印度在亚非事务中的威信和领导力。在这个层面上，印度代表团的塔什干之行，无疑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失败。

#### 四、结语

本文以议程变更引发的“反-反殖民”争议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了印度参与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曲折经过，着重探讨了两位印度团长“异常”之举背后的理性因素。这场戏剧性的风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冷战初期的印度，试图从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大国转型的身份焦虑。它一方面需要借助亚非国家的支持走出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又因与美苏的利益牵扯而无法真正认同和接受广大亚非国家的诉求。正如维杰·普拉萨德定义下的“第三世界”，“亚非”本身也是一个人为构建的“工程”，而非客观意义上的“地域”。<sup>②</sup>印度代表团在塔什干会议上的境遇，向我们充分揭示了构建“亚非工程”需要调和的异质因素，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外交政策、文化立场、个体身份等诸多层面的差异乃至分歧。这在本文中直观地体现为各国对待反殖民主义的不同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塔什干会议所暴露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亚非作家运动在1960年代中苏交恶背景下的大分裂。最后，印度作家在塔什干会议期间的分化与斗争，揭示了印度知识界在冷战势力裹挟下所呈现的新局面和新问题，同时很好地诠释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非文本视角考察独立后印度文学的宝贵契机。

[责任编辑：李丽]

---

<sup>①</sup> 班纳吉和安纳德的努力并未改变反殖民主义成为大会议程第一项的结果。为了抵消这一结果的负面影响，他们坚持在议程第二项“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上“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参见Ralph Parker, ‘The Tashkent Conference: Establishing Cultural Contacts’,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7, 1958, p.6.

<sup>②</sup> Vijay Pras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New Press, 2007.